

· 慈善事业 ·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之特色： 刚性、韧性与可塑性

杨方方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卓越成就促使各领域积极探寻特色发展路径，现代慈善事业走特色发展之路也已成为广泛共识。但慈善特色发展实践在“什么是特色”“如何判别一个国家、地区或领域的慈善事业有没有特色”“怎样有效发展特色”等基础问题上还存在困惑。现有研究不仅没有充分回答这些关键问题，还呈现出泛化、表层化以及异化倾向。从语义层面分析，“特色”兼具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种词性，分别对应特色的三重属性。作为客观存在状态的名词“特色”，并非泛指所有的“特别”，是特色刚性的体现；作为稳定特性表征的形容词“特色的”，是特色持续积累的成果和特色韧性的体现；作为动态演化过程的动词“特色化”是慈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彰显了特色的可塑性。聚焦特色的刚性、韧性与可塑性，有助于明晰特色边界、特色的状态实现与持续的内在支撑，以及特色化的实质与原动力。特色的刚性涵盖性质、层级、内容和程度四个方面，特色的韧性源于内生性（内生特质）、特定性（特定道路）与发展性（动态调适）的共同作用，而特色的可塑性表明特色化是精细化推进科学化的过程，原动力来自慈善认知能力的持续提升。

[关键词] 现代慈善事业；特色；刚性；韧性；可塑性

在当今公共议题和社会讨论中，“特色”与“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词一样备受关注，而且是最具热度和辨识度的词汇。^①众所周知，社会对“特色”的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制度的一系列创新等“特色化”措施，营造出公平且充满活力的发展环境，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奇迹。受此启发，各领域纷纷将特色化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慈善事业亦不例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已成

[作者简介] 杨方方，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体系建设研究”（23&ZD18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慈善市场的失衡与矫治”（21FGLB066）。

^① 根据 2024 年 11 月 1 日的中国知网标题检索，标题中包含“特色”的文献达 334483 篇，是包含“现代化”（163430 篇）文献的两倍多，也多于包含“高质量”（194389 篇）的文献。

为全社会的共同期待与普遍共识。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依赖于细化的制度机制的支撑与转化,同理,慈善事业的特色也必须依靠各地区、各领域、各场域以及各层次慈善效应的共同作用才能得以实现。然而,作为特色化实践的后发领域,慈善事业各细分领域的特色化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对特色的一些基础认识尚不明晰。显然,全面而深入地剖析“特色”的本质与内涵是慈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且颇具挑战的重要议题。^①

一、研究的缘起

在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对“特色”的认知尚不清晰,而现有研究也未能充分解答这些困惑。

(一) 需明晰的基础问题

发展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要先厘清三个基础问题:“什么是特色”“如何发展特色”“如何正确看待特色”。

1. 如何甄别“特色”

在慈善事业的交流与实践中,“特色”常被提及,却往往陷入自我总结与主观认知的困境。许多所谓的“特色”仅是组织或个体的自我感觉良好,难以获得外界的广泛认同。实际上,特色并非孤立存在,它源于内在特质,并通过公认的效用价值来体现。换言之,特色既具有客观性,需要得到广泛认可,又带有主观性,取决于个体或集体的认知与评价。然而,如何将这种抽象的评价标准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判断依据?即便有了明确的标准,又该如何在不同情境中进行比较?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视角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意味着比较的维度可以无穷无尽。从逻辑上看,过于宽泛的比较维度可能导致内部差异被中和,使特色难以显现;而过于细致的维度又可能使特色在综合评估中被淹没。因此,关键在于科学界定比较维度,既要使特色在细节中得以彰显,又要使其在整体上具有辨识度。

2. 如何发展“特色”

慈善事业的特色发展必须遵循共性与规律,^②这可引发一系列亟待思考的问题。如何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妥善处理共性与个性、规律与创新的关系?现有的“特色”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还是内在特质自然形成的产物,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前者,“特色化”似乎是一种基于明确目标的规划设计过程;如果是后者,“特色”则更像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无需刻意打造。如果两种模式都有效,哪一种更值得鼓励?看似无心插柳的自然模式是否真的能无为而治?而规划设计出的特色又如何确保可持续性?或者说,“特色”发展本就是融合自然演进与规划设计相的过程?若是,哪些方面应顺其自然,哪些方面需主动干预,又该如何干预?“特色”是否有不可逆的生命周期?面对社会环境变迁,对“特色”是放任自流还是持续干预?若持续干预,是以维系原有特色为导向,还是根据环境变化发掘新的特色点?

^① 宫蒲光:《关于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

^② 郑功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论纲》,《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3. 如何看待“特色”

在一项事业的发展中，特色发展与夯实基础目标，哪个更重要？在民生保障领域，满足普遍需求、持续改进基础服务、确保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实效性为基础目标无疑是核心。然而，“特色”作为差异化优势，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它能够在满足基础需求之上，为民生保障事业增添独特亮点，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但“特色”是否是解决民生保障问题的万能钥匙？所有的特色化建设都能夯实基础功能吗？对特色的过度追求是否与民生保障的根本目标和普遍需求相矛盾？如果矛盾，又该如何协调？民生保障领域的滞后是由于特色化建设不足，还是因为基础服务薄弱、资源分配不均、政策执行不力等更深层的原因？过度追求特色是否会成为一个标签或借口，掩盖真正的问题？没有稳固的基础，特色化的尝试是否会成为空中楼阁？其他领域的特色实践又能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特色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特色化过程应遵循什么原则，才能在提升民生保障基础能力的同时锦上添花？

笔者试着从现有研究文献中寻找答案。为了更全面地洞察“特色”的研究现状，笔者将视野拓宽至慈善事业的上位概念——社会保障领域，以期更深入地理解“特色”的内涵与外延。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在社会保障与慈善领域，诸多学者已围绕“特色”展开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如下。社会保障特色研究聚焦于其发展依据、逻辑、路径，以及制度的核心特征、基本要素、进展、问题与行动方案等，主要观点包括：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社会保障特色化的基本路径；其基本要素涵盖政治要素（以人民性为根本特征，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经济要素（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要素（适应社会结构变化与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文明要素（融合中华传统保障机制与本土文化元素）和国际要素（借鉴国际经验，遵循客观规律）。完善该制度的行动方案需着重理顺总体取向、优化现行制度安排等。^①特色慈善事业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理论创新以及特色化发展的思路、原则、规律和路线上。主要观点包括：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应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构建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其理论特质应是“三色同构”，即慈善的“自愿、公益”原则，现代慈善的“平等、法治”特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烙印与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基因的结合。体系结构宜采用“基础”+“主体”+“补充”的大慈善架构：以社区慈善为基础，现代慈善为主体，个人网络求助等为补充。^②中国特色慈善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其与欧美慈善的根本区别在于慈善文化渊源不同。未来，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需遵循“扬弃”与“融合”的规律，既要摒弃糟粕，又要与世界接轨，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③

上述观点几乎涵盖了已有特色研究的宏观思路与主要维度。从整体上看，现有研究仍不能充分明晰特色实践面临的困惑。系统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泛化、表层化乃至异化的倾向。

1. 研究的泛化

特色的使用过于随意，在修饰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同时，使“特色”沦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筐”。一是“特色”沦为修饰词。多篇以特色为主题的研究文献，缺少专门对特色的阐述，“特色”成

① 郑功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论纲》，《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② 郑功成：《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公益研究》2025年第1期。

③ 宫蒲光：《关于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

为可有可无的限定词,甚至更像是一种立场,没有实质意义,缺少对“特色”的内涵和判断标准的总结提炼。在部分文献中,“中国特色的”等同于“中国的”;另有文章将“特色的”与“科学”“健康”“蓬勃”等修饰词混用,甚至部分文献标题中的“特色”一词完全可以去掉。^①二是“特色”成了一个“筐”。有的文献将“特色”与规律混为一谈,甚至将慈善事业共性的内在追求当成特色。^②其实,“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享理念”“依法行善”“多维监管”等是特色产生的前提,而非特色本身。有些文献在未阐明特色慈善理论的情况下,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伦理思想的理论内涵丰富,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突破、创新、发展和完善等;在未阐明特色慈善观内容的情况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面临三大困境。^③有的文献在总结中国特色慈善文化时,采用了一种近似于合集式的归纳方法。例如:中国现代特色的慈善文化=“中国的”慈善文化+“现代的”慈善文化+“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文化。^④

“特色”是指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属性或特征,是通过多个限定条件的共同作用才能形成的独特性。从逻辑上讲,“特色”更像是多个约束条件下的交集,而非并集。据此,“+”改为“×”或许更契合“特色”的本义。

2. 研究的表层化

研究的表层化体现在对特色的内涵与逻辑机理提炼不足和缺少对特色的辩证思考。一是内涵与逻辑机理提炼不足。不少研究过于强调“特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却未能深入系统地提炼其内涵和逻辑机理。例如,有的文献用大篇幅梳理慈善组织增长、慈善捐赠结构、法律政策演变等表层事实,并未触及“特色”的内涵实质。^⑤有的文献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思想的理论来源、发展历程和现实构建,也尝试对其“界定”,可“界定”仅止步于对特色慈善思想框架逻辑的抽象概述,未触及其内在的实质性内容。^⑥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五个以”的宏观思路,^⑦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的治理路径”等治理经验。^⑧但这些宏观指导思想必须转化为更具操作性的原则和路线才能有效指导实践。二是缺少辩证思考。已有的慈善特色研究对过度追求特色化可能引发的风险缺少预测和警醒。在特色研究和实践相对丰富的教育领域,不乏对“特色化”的反思。例如,一些学校在追求特色化的过程中,容易陷入功利主义陷阱,为追求外部评价和宣传效应,而忽视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学校的长远发展,偏离了基础教育全面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任务。特色化教育虽能

① 吴宏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路径》,《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李海峰、周青:《“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理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

② 彭柏林、陈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的经验与展望》,《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2期;罗叶丹、邓国胜:《共享理念视角下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逻辑理路》,《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张波:《政治、慈善与权利:中国特色残疾人福利权的历史演进与科学体系》,《社会政策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王银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观建构的伦理反思》,《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9期。

④ 孙芳芳:《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溯源与现实建构》,《理论观察》2020年第11期;安连朋:《刍议中国当代特色慈善文化》,《学理论》2014年第25期。

⑤ 吴宏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路径》,《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

⑥ 孙芳芳:《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溯源与现实建构》,《理论观察》2020年第11期。

⑦ “五个以”: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坚持人民至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为鲜明主题,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行为重要原则,以科学的思想方法为基本路径。参见钟新平:《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遵循》,《中国社会保障》2024年第3期。

⑧ 彭柏林、陈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的经验与展望》,《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激发创新，但往往缺乏持续性和深度，甚至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均等。^①相比之下，慈善领域的发展历史较短，但同样需要警惕在特色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视和功利化陷阱。

3. 研究的异化

在慈善公益及社会保障等相关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异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对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特色的正确认知。一是将“问题”当“特色”。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例，其构成复杂，不同子系统及项目间运行机理存在显著差异。但无论哪个项目，分配调节功能与再分配力度都是衡量其价值的关键。在我国，有些社会保障项目再分配功能较弱，甚至产生了逆向再分配，导致制度的多重效用难以发挥。^②例如，板块分割、统账结合、多缴多得的养老保险制度，其再分配功能有限，且牵引作用强，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偏好趋同和教育焦虑问题，并阻碍了人力资源的流动与价值的充分实现。然而，在某些文献中，非但没有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反而将“多缴多得”提升为整个社会保障的特色与灵魂，视为社会保障文化的精髓与发展方向，这种将问题视为特色的思路显然背离了特色的基本逻辑。二是背离常识，逻辑混乱。有文献认为“多缴多得”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核心，与“多劳多得”是我国初次分配之特色同理，并警惕“大锅饭”思维进入社会保障领域。^③然而，这一论述存在多处逻辑矛盾。其一，作者一方面强调“多缴多得”是中国社会保障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强调与西方“缴费与权益对等原则”相契合；其二，“多劳多得”是国际社会劳动力市场公认的有效分配原则，并非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方式；其三，呼吁“多缴多得”，强调要强化多缴多得因素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就业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存在同样的逻辑错误，都是分配领域与分配逻辑的错误匹配。前者是把初次分配逻辑用到了再分配领域，后者是把再分配逻辑用到了初次分配领域。

现有研究不仅无法充分回答上述基础性问题，还使得特色的讨论趋于标签化和符号化。长此以往，公众会缺乏对社会现象和深层问题的洞察力与解释力，无法提供具体且深入的指导，这种表面化的讨论不仅限制了实践的有效性，甚至可能导致形式主义的泛滥。有些慈善项目只追求短期和表面的“特色”效果，却忽视了真正的社会需求、长期有效性以及社会价值，这不仅会降低资源分配效率，还会加剧社会不公与矛盾，进而可能损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与支持。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特色”一词的空洞化使用，不仅扭曲了公众的认知逻辑，更对社会认知生态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在慈善领域，会限制公众对慈善事业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识，使公众对慈善事业产生过于简化、理想的期待。在这种认知惯性下，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理解日趋单一，既无法适应时代对复杂认知能力的要求，也加剧了慈善生态的脆弱性，使得慈善领域面临“一损俱损”的系统性风险。

鉴于此，对慈善事业“特色”进行语义层面的分析与解构，无疑是解决特色实践问题、推动特色慈善事业研究的重要议题。从语义层面看，“特色”这一概念具有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三种词性，分别对应着“特色化”过程、“有特色”的以及“特色的”状态。“特色化-有特色-特色的”三种词性的特色之间的相融互生，构成了完整的“特色”作为客观存在状态的名词属性，

① 刘永强：《学校特色文化建设的异化与回归》，《教学与管理》2015年第34期；唐汉卫：《学校文化特色建设的几个误区》，《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年第5期。

② 杨方方：《社会保障的力量传导与质量提升——兼评“福利病”论调》，《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③ 郑秉文：《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文化内涵与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社会保障》2012年第11期。

“特色”的成立需满足一定条件,可谓特色之刚性;作为稳定特质表征的形容词属性,“特色的”状态的实现是特色持续积累并达到一定显著程度的体现,是特色具有发展韧性的结果;作为动态演化过程的动词属性,“特色化”过程是慈善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过程,即特色之“可塑性”。本文将通过对特色的“刚性”“韧性”和“可塑性”系统分析,提炼特色与非特色的区分标准,归纳“特色”到“特色的”的内在支撑与实现路径,解构“特色化”的实质与底层逻辑。

二、特色之刚性:不是所有“特别”都是“特色”

《现代汉语词典》将“特色”定义为“事物所表现的独特色彩、风格等”。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特色的辨识度和显著性,更隐含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即所谓的特色应当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额外成就或价值贡献。

(一) 性质刚性:“特色”是积极的输出

从语义逻辑上看,“特色”蕴含着积极向上的动力与向善的本质,是一种能够推动事业系统性提升的积极输出。

1. 特色是“好”的结果

在我国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存在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境遇、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这些问题绝非特色,而是亟待改革解决的难题。^①我国的现代慈善事业起步晚,制度仍不完善,“公益慈善领域多次出现道德底线失守的现象”,^②慈善领域乱象丛生,本质是各类慈善主体心理成熟度不足的具象化呈现,表现在:矛盾心理下的浅尝辄止;狭隘心理下的道德绑架与粗暴施舍;急躁心理下的索捐与抱怨;脆弱心理下的屈从迎合。^③这些不成熟的心理状态,导致很多人满怀热情地走进慈善,却伤痕累累。按照现代慈善文化的标准看,我国的慈善文化具有两面性,既有乐善好施的一面,也有封闭而内敛,依赖性强、缺少自主性的一面,^④唯有那些与现代慈善理念深度契合的内在特质,才具有发展成为现代慈善特色的潜质。

2. 特色是“特别”好的结果

真正的“特色”并非简单体现在数量上或效率上的优势,而是基于质的差异所展现出的独特优势。此处的“特别”并非表示程度的副词,而是指与众不同的良好结果,即独特的积极输出。例如,在捐助弱势群体过程中,募捐规模大小、受助对象数量多少等相对优势并非“特色”;而那些在传递物质资源的同时,高度注重情感传递,致力于提升求助者心理能量与精神生命价值的慈善组织,更有可能塑造出特色。特色的关键在于:相较于同类活动,是否存在显著的“质”的差别,并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与文化效应。

(二) 层级刚性:“特色”是“比”出来的

特色是相对的,是比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在一定的维度、层级、场域下,与其他同类事物比较出来的。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是相对于其他同类主体或事物的共性而言,“特色”并非

① 魏雅华:《“中国特色”与“伪中国特色”》,《经营管理者》2007年第1期。

② 赵敬丹、张帅:《中国公益慈善教育的未来走向》,《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③ 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和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4期。

④ 杨方方:《慈善文化与中美慈善事业之比较》,《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简单的个体间差异；二是不同的比较层级对应着不同的比较主体集合。具体而言，当讨论中国慈善事业的特色时，是将其与其他国家慈善事业进行比较，揭示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同理，剖析浙江省慈善事业的特色时，需将其与国内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而讨论杭州市慈善募捐的特色时，需将其与其他城市的慈善募捐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这种比较并非单纯寻找差距，而是聚焦于挖掘各主体独具的差异化特质，即发现并提炼某一事物显著且独特的属性或属性集合。

表 1 “特色”的比较层级与内容示例

“比较”层级		“比较”的主体与内容
国家级	中国慈善事业的特色	中国慈善事业的特性 vs 其他国家慈善事业的共性
	中国慈善监管的特色	中国慈善监管的特性 vs 其他国家慈善监管的共性
省级	浙江慈善事业的特色	浙江省慈善事业的特性 vs 其他省慈善事业的共性
	浙江医疗慈善的特色	浙江省医疗慈善的特性 vs 其他省医疗慈善的共性
市级	杭州市慈善事业的特色	杭州市慈善事业的特性 vs 其他城市慈善事业的共性
	杭州社区慈善的特色	杭州市社区慈善的特性 vs 其他城市社区慈善的共性

可见，“比较”的层级、维度、角度和对象不同，得到的“特色”也各不相同。尽管不同地区、领域、场域、主体、组织的慈善活动各有聚焦与目标设定，但同一维度下其他同类主体或事物存在共性是“特色”得以存在的前提。若在某一特定参考维度下无法提炼其他同类事物的“共性”，则在该维度下“特色”也就无从谈起。此时，若要提炼“特色”，需重新调整比较的层级与维度，切换观察视角。

（三）内容刚性：特色源于基本目标与伦理的坚守

如前所述，特色源自一事物区别于同级别其他主体共性输出的独特输出。狭义地看，“独特输出”是在共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额外价值；广义的“独特输出”包括共性内容和额外价值的总和。广义与狭义的特色输出关系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广义的“特色” = 基本目标功效 + 特别功效（狭义的“特色”）

可以说，实现基本目标功能是“特色”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内容刚性的核心所在。如果一项事物的基本目标功效出现偏离，则无法谈及“特色”。因此，“基本功能 + 特别功效”构成了“特色”成立的充分条件。需指出的是，“特别功效”并非历经时间积累逐渐呈现出的衍生结果，而是基于基本目标功效之上的更高层次输出，彰显跨层效应，是一项事业实现突破与升维的起点。

1. 特色不能损害分配正义和价值伦理

“特色”并非功利性的刻意追求，而是在遵循基本目标和分配伦理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这一过程不应以损害基本目标为代价，更不能违背基本伦理。一些组织把“资源”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通过刻意的形象塑造和夸大的宣传从而人为制造“特色”。这种做法不仅无法为社会提供实质性帮助，反而违背了慈善事业的初衷。慈善事业倡导现代慈善价值观，旨在最大限度地助力弱势群体。现代价值观蕴含比较丰富，包括人道主义和人本价值、志愿精神和自愿原则、道德多层次、陌生人伦理和感恩文化、散财的效用观等。然而，一些所谓的“特色”活动却违背了这些基本伦理。例如，据《南方周末》报道，2006年8月中旬，某市总工会组织企业家资助贫困大学生的“一对一”特色资助活动。活动中，22名受助大学生在《感恩的

心》的歌声中跳舞，场面感人。然而，一年后，多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受助资格，原因是他们没有给资助者写信。一些企业家表示“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①这种活动不仅违背了“尊重弱者”的基本伦理，也不利于树立广博的感恩观。

2. 特色蕴含超越基础目标的高层次输出

坚守基本目标与伦理是特色产生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通过精细化和科学化的解析，挖掘并拓展慈善事业的深层次价值，特色可能得以孕育而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慈善事业彰显出多重独特效应，涵盖分配正义、精神富裕、道德提升以及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创造。这些效应的实现，依赖于慈善资源的多元循环与高效配置。通过多层级资源的充分配置和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慈善事业能促进各类慈善主体实现资源整合、力量凝聚与能量升级，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生态的全面优化。随着情感经济和孤独经济社会的到来，促进人的认知提升、心理能量积聚和精神生命成长、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更充沛的情感传递等，这些超越物质层面的输出，更易成为慈善事业的特色标识。毕竟，社会资源唯有内化为人力资本与行动能力，才能在不同场景中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人的成长遵循“身安—心安—心动”的规律，这就要求慈善资源供给也需循序渐进地升级，尽可能提高物质资源的内化率，即向精神资源的转化率。^②

（四）程度刚性：“特色”具有社会辨识度

“特色”并非自诩或自我标榜，而是在行业内得到认可并被公众感知的结果。公众之所以能够感受到某一地区、某一场域或某一领域慈善事业的特色，就在于其特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获得公众的共鸣和认同。

1. “特色”能获同行认可与公众共鸣

理论上，每个事物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在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下，并非所有“特别”都能被深入探究。只有那些能够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并被公众感知的“特别”，才是真正的特色。公众对慈善特色的感知往往是直观和感性的，而同行则更倾向于专业和理性的提炼。以“希望工程”为例，作为中国慈善领域的标志性项目，它不仅在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引领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其成功体现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受益对象的多样性和社会多方主体合作的深度。这些影响和成绩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同业评议和专业评估等手段进行监测。从专业视角来看，“希望工程”的成功是一系列特色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根本特色在于融合了现代慈善的专业化、组织化供给体系与传统慈善供需双方直接对接的方式，实现了资源动员广度与情感连接深度的结合。

2. 特色的辨识度与观测层级的关系

社会影响力是考察“特色”的关键衡量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层级越高，特色就越突出。决定特色辨识度的重点在于相对影响力，而非单纯的绝对影响力。例如，从绝对影响力来看，国家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大于一个省的慈善事业，但国家层面的特色并不一定突出，因为国家的特色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得出的，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内部影响因素众多，独特性容易被稀释、中和。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观测点选择的结果，不同的观测点可能揭示出不同的特色。慈善系统作为资源流动的过程，其运作效果是不同部门和主体的综合作用，是多维、

① 潘晓凌、成希：《“感恩的心”是什么样子》，《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8日第A5版。

② 杨方方：《社会保障的力量传导与质量提升——兼评“福利病”论调》，《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多向力量相互作用的效果。观测点过于宏观时，内部不同方向的力量容易被中和或抵消，难以形成最大化的合力；观测点过于微观时，影响和力量太小，更难以形成以点带面的效应，从而无法对这一事业产生系统性提升，其影响也就难以得到同行的认可，更不可能被公众识别和感知。

三、特色之韧性：从“有特色”到“特色的”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具有“特色”，是因为其历经时间考验，穿越不同周期，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同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也需要经受时间检验，才能持续输出独特魅力和生命力，从“有特色”的初级阶段迈向“特色的”成熟状态。只有具备韧性，特色才能持续散发独特魅力，成为一项成熟的事业。

那么，如何让慈善事业具备这种“韧性”？基于广泛的理论综述与实践考察，特色的“韧性”根植于内在特质，受外界条件约束，通过特定的发展道路，动态调适以适应不同环境，从而持续展现独特风貌、魅力和价值。从静态角度看，从无到有，“特色”的生成逻辑可表示为：

“特色” = 内在特质 × 特定道路

而从“有特色”迈向“更特色的”，则是特色从有到多、从弱到强的过程。动态视角下，这个过程是一项事业坚持内生性、特定性和发展性的结果，其动态过程可表示为：

“特色的” = 内生性 × 特定性 × 发展性

“特色”是内在特质、外在约束与路径选择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从内至外的深度渗透和向外的自然溢出与辐射。具体而言，内在特质赋予其独特性，特定国情为其发展提供土壤，而科学发展道路则确保其方向与效率。三者共同构成了特色的三大核心属性，即内生性、特定性、发展性。内生性是指特色“内生”出来的，是内在的“种子”在适宜的生态环境下“长”出来的，非外力简单堆砌而得。特定性则意味着在道路选择上既要遵守共性规律，不偏离基本目标和功能，又要辩证处理好现代与传统、国际与本土的关系，找到最适合的发展道路。发展性意味着要在坚守内在特质和特定道路的同时，适应事物的发展阶段和变化，进行相应的变通。可以说，特色的韧性是内在特质、特定道路与动态调适三者深度交互、相互塑造的产物。内生性是特色的灵魂，特定性则是指引特色的航标，发展性则是特色的生命力所在。

（一）内生性：特色“源于”内在特质

慈善事业的特色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首先必须是内生的，是在特定环境下自然生长出的独特风貌。那些靠重金打造、资源堆积、外在手段强行植入，或者因一时热点事件或流行文化而跟风产生的暂时性、表面性特色，往往因缺乏实际内涵和持久价值而“昙花一现”。一旦外部资助、支持或其他临时性资源消失或减少，“特色”也将随之烟消云散，无法形成真正的影响力。

1. 内生特质是韧性的根基

内生性是指慈善运作与特定场域、区域、领域的深层慈善特质高度契合的属性。内在特质是慈善事业韧性的核心来源，虽然受外界环境、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但变化缓慢，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这些特质涵盖意识、道德观念、文化、价值观、责任意识及认知等多个方面，深植于文化土壤之中。与内在特质相契合意味着慈善运作需紧密结合特定场域的文化土壤、社

会需求及民众心理。这不仅决定了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和资源分配效率，还直接影响到其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强大的内部动力系统，包括自主发展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恢复力。通过强化与内在特质的匹配度，能够增强慈善事业的韧性，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定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匹配并非简单的适应，而是在适应的基础上引领公众认知，以先进的理念和价值观引领慈善事业发展。

2. 内在特质的五大衡量维度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内在特质，可以参照“人格特质”的衡量维度。个体是慈善事业中最基本、最根本的主体，无论是制度设计与执行中，还是企业决策与实践，归根结底都是关键个体在发挥作用。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人格特质，“人格”是个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稳定模式，“特质”是构成不同人格的元素。特质是由两个端点组成的连续体，是连续的而非离散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程度上，每个人都有一些核心的人格特质，但程度以及组合方式不同，就产生了个体差异。^①

“大五人格模型”是现代心理学家常用的人格特质评价方法，它从五个方面描述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即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②这些特质影响着个体在慈善事业中的表现。开放性体现为对新观念、新事物、新方法的接纳和探索；尽责性表现为对慈善活动的认真、负责和有条理的管理；外向性决定了个体在慈善事业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热情的参与态度；宜人性特质表现为对他人的善意、同情和合作精神；情绪稳定性特质在慈善事业中体现为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冷静和理性。这些内在特质不仅影响个体行为，也会塑造整个社会的慈善氛围和文化。社会是个体的集合，一个社会如果在以上维度具备较高的表现，其慈善事业往往具备更强的韧性。受上述的五个特质启发，结合个体从慈善爱心触发到行为模式，再到对慈善氛围、生态的影响，可将慈善特质归纳为慈善敏感性、慈善差异性、慈善能动性、慈善开放性和慈善信念感五个方面（如表2所示）。

表2 慈善事业的五大内在特质

内在特质	涵义
慈善敏感性	对慈善需求的敏锐感知，是慈善意识的直接体现，反映了社会成员爱心被唤起的难易度。
慈善差异性	个体或组织对于不同关系主体（如亲缘、地缘、业缘等）的慈善意愿、方式和力度的差异度，反映了潜在捐赠人与受助人的关系亲疏对慈善行为的影响。
慈善能动性	体现慈善主体的责任意识与行动能力，包括慈善参与主动性、参与方式的多样性与创新性，慈善组织在资源整合、项目策划、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和政府治理志愿失灵方面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性等。
慈善开放性	衡量慈善文化对新思想、新方法的接纳程度，以及对慈善创新、跨界合作与发展的开放态度与包容性。
慈善信念感	体现慈善主体在面对挑战、困难及舆情事件时的心理韧性与信念坚定性，关乎慈善情绪的稳定性，即在面对公信力危机等负面事件时，能否保持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与坚持。

从个体慈善意识的觉醒到行为模式的展现，再到对慈善氛围和生态的影响，这五大特质可以完整描绘个人或组织的现代慈善心理。每个慈善主体的内在特质都是这五大维度以不同比例

① 王芳：《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第14页。

② 王芳：《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第15页。

和强度的独特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不同主体可能在某一维度上表现出相似性，但很难呈现完全相同的组合。即使在同一维度下，只要细分指标足够细致，就会发现不同主体的特质存在差异。各类、各级慈善主体只有深入理解慈善文化，精准把握潜在捐赠者、目标捐助群体以及特定场域中的慈善内在特质，才能精准把握慈善需求，提高供给效率。

（二）特定性：特色“成于”特定路径

慈善主体基于对特定场域、领域内慈善文化内在特质、需求状况以及自身供给能力的评估，设定合理的发展目标，并据此科学规划出最优发展路径。所谓“最优”，应兼顾慈善资源分配的效用与可持续性。社会整体的最优结果是各慈善主体最优选择的总和。从理论上讲，特定道路是科学规律与自身个性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既尊重现代慈善事业的共性规律，又充分发挥本国或本地区的独特性。例如，设A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慈善主体，B为某一特定慈善领域或场域内其他同类主体的慈善运作案例库。为了科学规划自身在某一慈善领域或场域的发展道路，A特向B学习。依据A和B的内在特质是否相同，以及A与B的发展道路是否相同，可分为四种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特质-道路”异同的四种情况

		发展道路	
		相同	不同
慈善特质	相同	模仿 (目标能实现,但没有特色)	创新 (可能有优势,但不是特色)
	不同	照搬 (可能“水土”不服)	特定 (有可能产生“特色”)

注：理论上，在慈善领域，每个主体的慈善特质是独特的，这是个体独特人格特质的镜像和映射；那么具体到每个地区、领域和场域的慈善特质也是独特的。因此，并不代表慈善内在特质的完全一致，“相同”代表两种可能情况：一是可能只是某一方面的特质相似或接近，不足以影响道路的选择；二是认知洞察的局限，没有甄别出差别。

慈善主体的认知能力决定了其能否找到“特定”道路。这不仅需要洞察社会需求，判断所看到的是否为“真”需求和底层需求，还需评估自身条件与外在环境约束（如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制度建设等），进而准确评估自身资源调配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既契合当地实际又具科学性的特定发展道路，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供给能力，从而产生“特色”。从系统视角来看，慈善事业运作是多个慈善主体进行多维度向慈善力量传递的过程。慈善组织固然是重要主体，但公众、企业、政府、媒体等其他主体在营造慈善氛围、激发慈善活力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组织自身：“供需匹配”下的“最优”道路

慈善事业是对社会资源的自主性分配，其资源分配效应是众多慈善组织综合作用的结果。构建慈善资源分配的良性生态体系，其核心前提是慈善组织树立正确的分配伦理导向。在初次分配中，个人能力、贡献和主观能动性起重要作用，遵循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在再分配体系中，风险的社会性程度越高，资源分配越优先。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提高“下限”比进一步拔高“上限”更具人文价值。因此，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环节应遵循“弱者优先”的捐助伦理，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收入调节能力。慈善组织在制定慈善救助目标与方向时，必须

紧密结合其宗旨和使命，同时考量自身的供给能力及特定领域和场域内的慈善需求。目标设定相当于为慈善行动确定终点，明确要解决的问题或填补的供需缺口。从起点到终点的最佳路线是一系列最优道路的选择、组合和连接，是针对问题的深层原因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最优道路代表筹集、承载、传递和转化慈善资源的最佳方法。为了形象展示既定慈善领域和场域中慈善资源配置的主要进路，可将其过程简化为如图1所示的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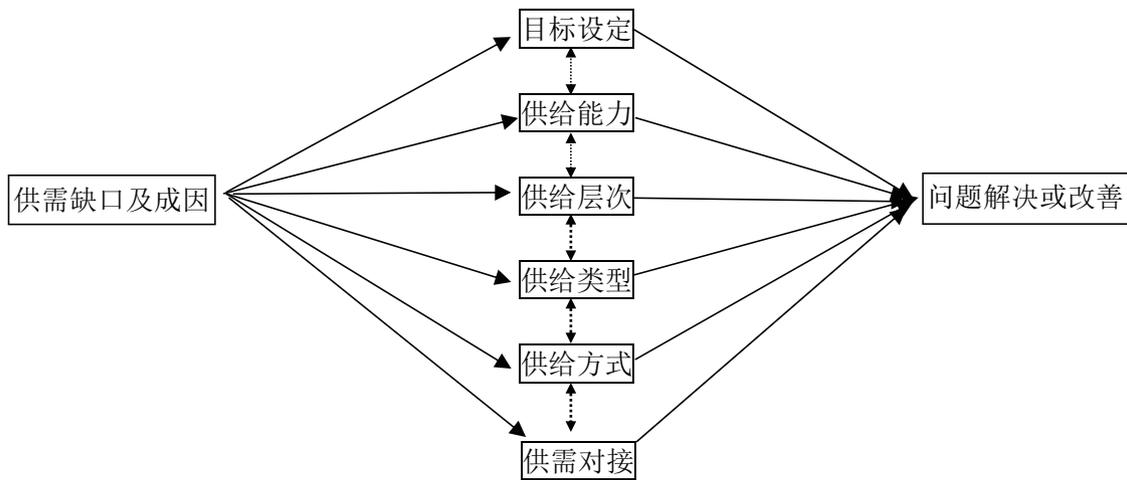


图1 慈善路线规划

慈善组织的资源配置过程由慈善领域、场域、类型、层次和方式等多维度限定。其中，类型和方式的丰富性以及层次的弹性尤为关键。目标设定和具体路线应依据供需匹配原则来确定。“供需匹配”是指慈善组织在充分了解自身供给优势与能力的基础上，精准识别社会供需缺口及其成因，本着分配效用最大化原则，科学地确定资源分配目标并明确慈善内容。慈善资源供给框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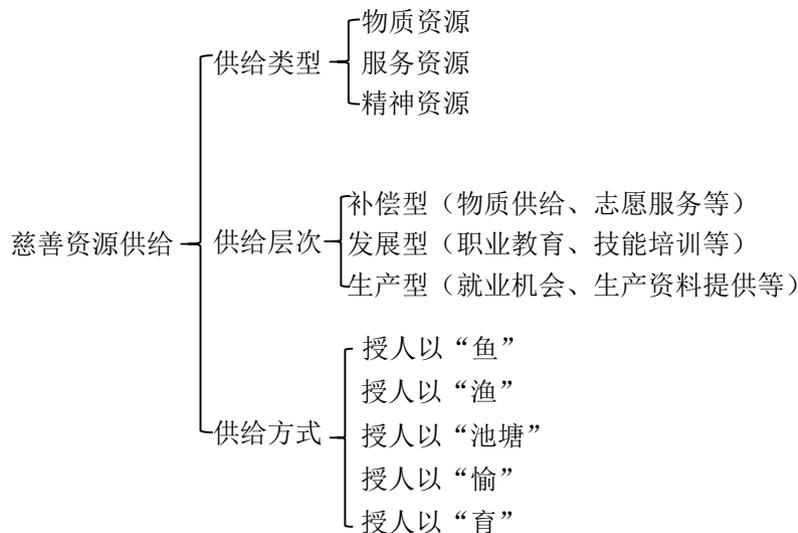


图2 慈善资源供给

2. 外部的助力：行业建设和政府支持

慈善组织的资源分配效能只是慈善配置系统宏大图景中的一个微小“点”。要实现行业、区域或领域的整体集合与集约效应，必须将这些孤立的“点”巧妙地串联成“线”，进而扩展

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面”，形成独具辨识度的特色效应。慈善组织能否达到“最优”状态，不仅取决于其个体的卓越表现，更在于整个慈善行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与配套服务健全与否。而这一切，均离不开政府坚实有效的支持，以及精准预防和矫治志愿失灵的能力。行业基础设施从根本上决定了行业的发展高度，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则为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资源保障。完善慈善行业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需要政府给予切实支持。此外，在治理慈善组织自身难以克服的志愿失灵问题上，政府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承担财政、引导与监管责任外，政府能否有效做好政策供给，是能否成功矫治志愿失灵的关键因素。其一，政策供给的数量与层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其二，政策工具的类型、组合选择以及政策间的衔接，对慈善事业能否实现既定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三，政府应避免过度干预，在尊重自愿、杜绝强制的基础上“适度作为”，构建以“引导”为主旋律的慈善政策体系。^①

表4 政府支持慈善事业的四种模式

要求 / 支持	高支持	低支持
高要求	引导者	强制者
低要求	守护者	放任者

资料来源：参照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大卫·耶格尔（David Yeager）在《怎样激励10到25岁的人（The Science of Motivating Young People）》中对领导力心态的分类制定。

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模式可以从“要求”和“支持”两个维度进行分类，共有四种角色（如表4所示）。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扮演“引导者”角色，在对处于“青春期”的慈善事业提出高要求的同时提供全方位支持。

（三）发展性：特色“显于”动态调适

内生性和特定性只是特色产生的起点，能成为一项“特色的”事业，意味着其“特色”输出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鉴于外部环境持续变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稳定和持续的特色输出必然依托敏锐的洞察力、迅捷的反应力，以及主动且系统应对变化的动态调适能力。动态发展调适能力赋予慈善组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潜力，促使特色产生累积效应，是特色产生累积效应，质变为“特色的”的重要能力。而动态发展调适能力受限于深层次的认知水平。

1. 拓宽认知，智慧地吸纳技术

理论上，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能促进慈善资源分配更高效、更精准和更主动；促进慈善组织与社会成员的连接更便捷、更深度和更持久；促进慈善环境更文明、更包容和更开阔。但从实践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已与慈善事业现代化出现了结构性偏离。^②在网络社交、移动支付、流媒体技术等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下，慈善活动逐渐内嵌到社交、消费、追星等日常生活场景当中。这些慈善活动反而成了标榜“现代”的西方评价体系所鞭长莫及的“后现代”领域，^③似乎成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特色；但这个特色是有待验证的。因为是互联网公司而非慈善

① 张奇林：《共同富裕目标下慈善事业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3期。

② 杨方方：《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③ 史迈、安姗姗：《从评价到对话：构建新的国别慈善样态描述框架》，《中国非营利评论》2021年第1期。

组织这一慈善价值的守望者与传播者成为数字慈善的主导者，互联网平台背后与慈善公益目标不一致的社会意图和商业力量正形塑着公益的发展方向和主导着新兴慈善的议程设置。^①

同时，没有道德伦理加持的“技术”会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器。因此，有必要将道德价值嵌入技术环境，引导公众自觉做出符合伦理的选择。让技术道德化，保证技术强者与价值强者的结合，提高价值强者的技术能力，提高技术强者的慈善浓度。实现技术人性化，处理好技术与人文的关系，直面超越技术局限，促进算法智能与人工智慧相结合，用人的智慧来弥补对于算法与现实的间隙。^②让技术应用有度，认识到技术的有限性和鼓励线下鲜活的慈善场景和真实的互动，因为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的情感感知和体验。

2. 注意“传统”的流变与分化

传统一直在流变之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坚守传统才能有自己特色。的确，即便社会变迁、城市化进程、人口结构、家庭规模与模式等趋势显著且不可逆转，传统慈善在现代化进程里依旧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必须认识到一切都在流变之中，传统本身也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持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所对应的时间节点也不断向前。哪些逆势因素逐渐式微，哪些趋势性因素被吸纳融合，均需仔细甄别。故而，传统不应被机械地坚守，而需进行有效识别、深入领会，并实现动态适应。

传统不是一个统一的模板。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流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横向差异和纵向分化。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有所不同，相应地，“传统”流变的过程也可能存在诸多微妙差异，可能保留着各异的传统元素，慈善文化特质也难免存在差异。但专业评价体系往往以统一的组织化的“正式”慈善活动为评估核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非正式”的本土慈善活动被忽视，这些评价体系愈来愈无法捕捉到慈善鲜活样态的全貌。^③传统在纵向演变中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生活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显著差异。比如，个体空间和家庭生活方式，可能已较快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然而，社会归属和社会成员间的连接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乡土社会的习惯。因此，应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审视，对于那些有益于现代慈善发展的传统文化元素，应有意识地保留和强化；而对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性相悖的部分，则应主动塑造和引导。传统的流变和分化意味着，在提炼特定地区、特定领域的“传统”时，慈善主体应对文化特质进行精细辨析，对不同特质进行重新组合与动态诠释，进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慈善文化表达。

3. 开阔地理解慈善模式更迭

从国际慈善实践来看，慈善资源供给的内容与方式处于动态递进、日益丰富的进程中。从个体化慈善（个体直捐）发展到组织慈善（慈善组织专业运营），再到企业化慈善（社会企业、共益企业）以及向善商业（通过减少穷人支出解决资源匮乏），新型慈善模式的出现促使慈善的组织性成分不断增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模式的退场，各种慈善模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① 叶晓君：《技术神话光环下的中国慈善公益》，《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

② 杨方方：《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③ 史迈、安姗姗：《从评价到对话：构建新的国别慈善样态描述框架》，《中国非营利评论》2021年第1期。

个体慈善作为最接近人性本能的表达方式，是孕育组织慈善的土壤。个体直捐式慈善具有灵活性和辨识度，但难以保证慈善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相较于个体慈善，组织化慈善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但仍难以避免“志愿失灵”的问题。企业化慈善结合市场手段以精确的理性应对社会问题，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更为深入。在健康的慈善生态中，不同慈善方式优势互补、并行不悖且互促互生。^①传统慈善以直捐方式为主，组织化慈善为辅的形式；现代慈善则以专业慈善组织为主，个体捐赠、企业化慈善等多种方式辅助的慈善生态。各慈善供给层级和组织形式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其差异更多体现在现代化程度不同。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慈善方式的存在感可能会此消彼长，但始终都是现代慈善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现代慈善模式并非对传统慈善模式的简单替代，而是对传统模式的丰富与拓展，是将各种慈善模式囊括其中，共同构建起一个多元、包容且富有活力的慈善体系。^②

四、特色之可塑性：“特色化”的基石与原动力

特色的可塑性是在特色化过程中慈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特色化是慈善主体在动态社会环境中塑造、维持和强化、升级特色的能力。“特色化”是慈善事业从“无特色”到“有特色”“有特色”到“特色的”之间的连接线，串起慈善资源配置循环的发展全程。这一过程可抽象表述为“无特色—特色化—有特色—特色化—特色的”。特色化过程的推进依赖于内生性、特定性和发展性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并且这三者相互交织，共同蕴含着“科学性”因子，即特色化的内核要素和原子构成。特色化的过程就是追求科学化的过程，涉及特色在产生、形成、强化直至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阶段。内生性、特定性与发展性恰恰是一项事业在不同维度、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科学性要求的体现与提炼。科学性的无限探索性，人类永恒的好奇心与进取精神是特色可塑性的根本保证。基于“无特色—有特色—特色的”的演进路线，“特色化”的推进逻辑和路线可简化为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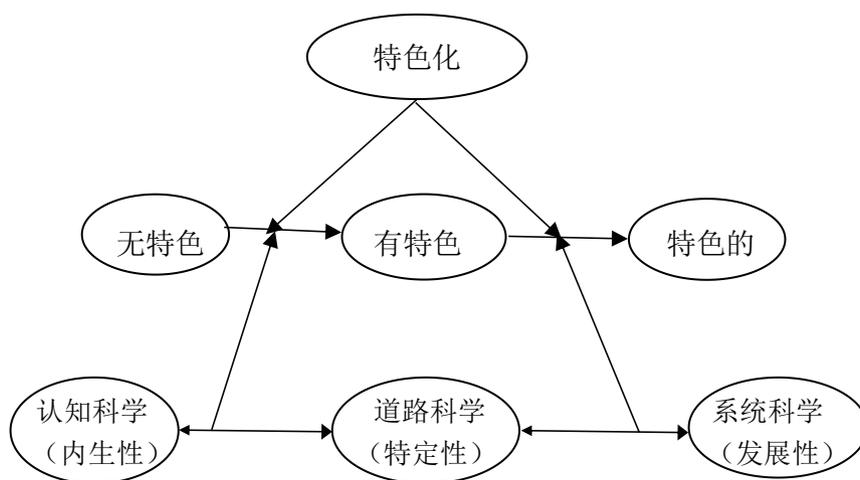


图3 “特色化”推进的路线与逻辑

① 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和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4期。

② 杨方方：《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内生性标志着科学性的起点,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特定场域和群体的慈善特质,不仅是慈善主体认知能力的体现,更是慈善事业科学发展的基石。特定性体现了基于科学性的道路选择原则。发展性则是科学性的动态展现,强调对多种因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权衡,并进行适时的动态调整。特色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科学化原则应用到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过程。科学化不仅是特色化的基础,也为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当然,特色化也为科学化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一) 科学化是特色化的基石与实质

科学化不仅是特色化的本质属性,更是其持续进阶与演进的内在驱动力。科学化要求在特色塑造过程中,深入理解慈善活动的本质规律,确保特色化在对慈善使命和目标的深刻理解基础上进行开拓性实践。

以科学化为基础,“特色化”才能避免“窄化”和“残化”。若慈善事业忽视科学原理和逻辑规律,其特色化可能被异化为片面的优化,进而引发其他方面能力的退化和“残化”。在慈善事业中,这种“残化”可能表现为忽视慈善事业的整体性和多元性,过度聚焦特定领域、内容或技能,致使功能趋向单一化和狭隘化;甚至以特色化之名,过度追求个性化和独特性,使慈善发展路径越走越窄。以科学化为基础,能确保“特色化”不与基本目标功能实现相悖,不是浅尝辄止的标新立异和偏离慈善事业本质的形式化特色。

以科学化方向,“特色化”才能保持开放的“机警”。管理学大师查尔斯·汉迪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悖论,其中之一就是“成功的”悖论,即过去获得成功的途径会形成路径依赖,而要打破悖论,必须保持好奇与警觉。^①我国社会组织对过往路径思维方式的依赖是社会组织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②坚守科学化,可以提高一项事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感和积极度,这种敏感性使慈善组织能够及时调整策略,形成应对不同周期的稳定输出。这种开放的警觉,既体现在对弱势群体困境的深度关切与理解上,也体现在对慈善事业内部结构性缺陷的精准洞察中。如此一来,富有特色的慈善事业便能持续高效传递资源,在更广泛的领域和层面实现能量的正向循环。

(二) 特色化的原动力与切入点示例

特色必然是科学的,不科学必然无特色。特色无需刻意营造,而是科学化精细推进的自然结果。追根溯源,特色化的可塑空间与塑造能力取决于科学化推进的深度与精细程度,而这又依赖于慈善主体对一项事业进行科学解构的能力。解构能力不仅取决于慈善主体对这项事业的整体认知,还包括其对特定领域、场域慈善特质的深入洞察,对信息、技术、制度等资源要素的创新性组合能力,以及对“科学化”的理解和认知。突破与创新是科学的具体实践表现,科学化既体现在方案设计、实施过程中的严谨性以及评估时的周密性,也体现在初始构思时的想象力和设计阶段的突破性。就此而言,慈善组织、政府等慈善主体应保持更加开放、通达、敏锐且富有洞察力的状态,持续升级和拓展慈善观,同时注重提升元认知,即审视和提升自身认知能力的的能力。

尽管全球慈善事业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被冠以“有效”“科学”“激情”“勇敢”等诸多形容,但要对一个国家的整体慈善事业特色进行高度凝练,依旧颇具难度。因为观测视角

① [英]查尔斯·汉迪:《空雨衣:个人与组织的精准定位》,机械工业出版社,2024年,第46-47页。

② 朱健刚:《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越宏观，内部相互交织的因素就越繁杂，特色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易被稀释、中和。从中观层面及具体角度切入，或许能够更精准地捕捉和归纳慈善事业的特色。在慈善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上，技术慈善化成为显著趋势。诸多慈善组织借助数字技术提升运营效率，通过大数据精准定位受助群体，运用区块链技术增强捐赠透明度，这些已成为行业内的常见做法。而更具特色的是，部分慈善组织不再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而是将其纳入慈善内容范畴，积极开展公众教育活动，力求缓解因技术进步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当慈善技术化成为多数慈善组织的常规选择时，那些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技术慈善化的组织，便有可能打造出自身独特的发展“特色”。与此同时，部分互联网企业依托技术发展带来的高额利润，加大慈善投入力度，甚至专门研发“向善技术”。这些技术从源头上，即在生产环节就向生理性弱势群体倾斜，充分展现出“向善科技”的独特魅力，正逐步成为企业慈善领域的新特色。

在现代化与福利水平双高的北欧国家，慈善活动高度聚焦个性化与差异化需求，进而塑造了社区慈善的独特定位。作为收集、表达和满足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的终端，社区不仅居民参与率颇高，还呈现出高度负责与积极主动的显著特征。由于不同地区对贫困归因存在差异，由此催生出多样化的慈善模式。在资源匮乏地区，补偿型慈善模式较为常见；而另一些地区则突破这一传统模式，秉持以人的发展为导向，高度重视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将提升个体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这种“发展型”慈善注重慈善项目的有机串联，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慈善特色发展的典范。

表 5 社区慈善可能的特色点

社区	比较维度	共性（其他社区）	特性
永泰村	慈善供给类型	补偿型	发展型
玉兰社区	慈善供给层次	物质层面	精神层面
水心社区	慈善服务场景	特定活动式	生活嵌入式

注：永泰村隶属于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水心社区隶属于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玉兰社区隶属于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这三家社区均入选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和腾讯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全国社区慈善实验项目。

在中国的慈善文化特质中，社区慈善、医疗慈善、企业慈善等领域都蕴含着丰富的特色潜质。基于文献梳理和实践调研，企业慈善与社区慈善场域在实践中展现出一些可塑空间，表 5 和表 6 分别展示了一些社区和企业的慈善特色点挖掘示例。之所以是“可能的特色点”，是因为特色不是自说自话，需要外界的识别。这些社区和企业的慈善特色还有待慈善学术界、实务界的认可和社会公众的认同。

表 6 企业慈善可能的特色点

社区	比较维度	共性	特性
腾讯公司	企业价值取向	商业价值兼顾社会价值	可持续性社会价值
	在数字慈善中的角色	积极参与者	创新推动者
蚂蚁集团	生理性弱势群体帮扶	授人以“鱼”	授人以“渔”

资料来源：雷明等：《可持续价值共创：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平台企业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基于腾讯酉阳共富乡村的案例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23 年第 9 期。

综上所述,刚性、韧性与可塑性三大特性共同勾勒了特色的轮廓。“刚性”为慈善事业特色划定了清晰边界;“韧性”将特色内化为慈善事业的固有气质;“可塑性”彰显了慈善主体在特色化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其核心动能源于慈善主体认知水平的持续提升。慈善事业的特色发展本质上是精准挖掘慈善特质、精细推进“科学化”原则、精心选择最优道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刚性构建稳定架构,韧性提供持续动力,可塑性注入创新活力。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在特色化道路上稳健前行。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Philanthropy: Rigidity, Resilience and Plasticity

Yang Fangfang

(School of Yingxian Philanthropy,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couraged various sectors, including philanthropy, to pursue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paths. While it is widely agreed that modern Chinese philanthropy should develop with unique national features, confusion remains over what constitutes such characteristics, how to identify them, and how to develop them effectively.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lacks depth and tends toward overgeneralization or distortion. Semantically, the term "characteristic" functions as a noun, adjective, and verb—reflecting three core dimensions. As a noun, it signifies an objectively existing feature, showing rigidity; as an adjective, it denotes stable, accumulated traits, reflecting resilience; as a verb, it refers to an ongoing shaping process by philanthropic actors, highlighting plasticity. Focusing o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helps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characteristics, explain how they take shape and persist, and reveal what drives the process of characterization. Rigidity involves nature, level, content, and degree; resilience stems from endogeneity, specificity, and adaptability; plasticity highlights a process of refinement and scientific grounding, driven by enhanced cognitive capacity in philanthropy.

Keywords: modern philanthropy; characteristics; rigidity; resilience; plasticity

(责任编辑:高静华)